



新中国农村发展60年丛书

丛书主编 李良玉

GONGHEGUO LINGXIU DE SANNONG SIXIANG

共和国领袖的“三农”思想

■ 王玉贵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农村发展60年丛书

丛书主编 李良玉

GONGHEGUO LINGXIU DE SANNONG SIXIANG

共和国领袖的“三农”思想

■ 王玉贵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领袖的“三农”思想/王玉贵著.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09.8

(新中国农村发展60年丛书/李良玉主编)

ISBN 978-7-81130-101-4

I. 共… II. 王… III. ①党和国家领导人—农业经济—思想评论—中国②党和国家领导人—农村经济—思想评论—中国③党和国家领导人—农民—问题—思想评论—中国 IV. F32 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9832 号

共和国领袖的“三农”思想

著 者/王玉贵

策 划/吴明新

责任编辑/汪再非 张 平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00 mm×960 mm 1/16

印 张/20.2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101-4

定 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李良玉

委 员

王玉贵

李良玉

吴明新

陈意新

周 棉

房列曙

温 锐

董德福



总 序

Preface

去年8月,江苏大学出版社邀我主持编写一套新中国农村发展60年的丛书,力求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发展的整体面貌,希望我尽快拿出总体设想和具体的编写计划。经过陆续的几次洽谈和商榷,编写与出版计划均顺利地落实了下来。

中国是具有悠久农业文明的人口大国,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全社会稳定的关键,应该说这是人们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三个正确的视点。也许,今天这三个视点仍然具有相当的正确性。新中国农村的发展,虽然至今才60年的时间,但却是自古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农村的土地关系,在这个阶段发生过,并且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里,土地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主轴。自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化以来,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成为中国沿袭不变的基本的土地形态,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才开始动摇。1950年前后的短短7年中(包括1949年前的3年多时间),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2000多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被摧毁。这个变革,其深刻的社会意义,至今还有解读的空间。20世纪50年代先后形成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制,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牢固的土

地公有制。相应地,它的解体,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形式下的“大包干”,即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政策的推行,其积极意义、历史价值和未来走向,也许又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实践才能充分认识的问题。

第二,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发生过,并且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农业经济的条件下,所谓土地关系,并不仅仅是封建领主与农民、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而且包括土地所有者、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在封建时代(暂时沿用这个说法),农民除了直接面对与地主的土地租赁关系以外,还间接面对着与国家的赋税关系。所以,每当封建帝王头脑清醒,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并且能适当抑制土地兼并和地主阶级剥削的时候,常常就是生产力发展,社会相对稳定繁荣的时候。中国的民主革命,把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社会解放的主要目标之一,有其合理性。但是,如何在废除了农民与地主的土地租赁关系之后,建立恰当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却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在农业集体化时代,理论上有着“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原则,而实际上,由于国家综合经济能力、农业生产力、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局限,由于全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社会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矛盾,要根本改善这个关系,难度依然很大。21世纪以来,农业税的免征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行,开辟了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新阶段,也揭开了现代农业的新篇章。

第三,农业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行业,其社会价值在这个阶段发生过,并且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所谓农业的社会价

值,有三个含义:一是它的产品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二是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在社会各界生活幸福指数排序中的位置;三是农民的自我社会评价。从生产力的角度研究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中国农业史,我倾向于把它划分为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和发达农业三种类型。所谓传统农业,是指农业的种植技术、生产工具和产出水平大致处于传统时代。所谓现代农业,是指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农业的种植技术和生产工具与传统时代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改良,从而使农业的产出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所谓发达农业,是指农业充分现代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从局部地区来看,中国现代农业的开端是在民国时期。但是,正规地进入现代农业的阶段,应该是在 1949 年之后,特别是在 1978 年之后。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即使高产的苏南地区,粮食亩产年平均也只有 500 斤左右的水平。就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完全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事情。直到今天,对于农业的重要性,或者说,对于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疑问。经常有人自豪地说,我们以占世界 7% 的土地,养活了世界 20% 以上的人口,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和农民的自我社会认同这两个指标,无疑至今仍然处在很低的水平上。根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农业的继续进步,从现代农业向发达农业转化。

根据目前的实际状况,发达农业的具体指标,应该包含科

技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和幸福农业 4 项内容。所谓科技农业,是指农业的总体科技含量、科技普及程度和前沿科技、尖端科技的应用率,达到一定的水平,并且发挥着相当的经济拉动效应;所谓生态农业,是指应用于农作物生长促进环节的诸种物质成分充分参与自然循环,充分实现了无害化、有机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农业的绿色程度;所谓集约化农业,是指农业直接连接国内外市场,实现了经济产出的专业性、批量性和收益性,具有相当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所谓幸福农业,是指由于前三者的综合影响,导致农业生产的轻松度、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农民作为一个生产者阶层的生活幸福指数和自我社会评价指标的大幅度提高,与其他社会阶层没有明显差异,甚至优越于其他社会阶层。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农村中的极个别富裕村庄,已经开始进入幸福农业的阶段。但是,绝大多数的农村,目前还是处于现代农业甚至传统农业的阶段。我估计,再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努力,将会有相当地区的相当数量的农村能够接近幸福农业阶段。

第四,农民的社会角色,在这个阶段发生过,并且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尽管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尽管中国传统时代始终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尽管中国传统时代从来维护士农工商的社会阶级结构,甚至,尽管当代中国长期坚持工农联盟的政治路线,但是,农民的社会角色却变化不大。从根本上说来,这是由国家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结构的极大变化,经济的强劲发展和城市化运动的提速,才使农民的社会角

色开始发生转换。最显著的变化,是千百万农民不断加入城市建设者、现代产业和城市移民的行列,短期地、长期地、永久地脱离了农村,以新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随着现代化事业的继续推进,农民阶级不断被消解的时代必将到来;而随着幸福农业时代的必将到来,一个与国民经济需求相适应的、需要保持必要数量的农场主阶层和农业蓝领阶层,将成为充满现代气息的新的社会阶层。尽管距离这一天还有十分漫长的道路要走,但是,认定改革开放是这个过程的真实起点,是不应该有疑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已经有了 60 年的发展经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其间,憧憬过美好的理想,也体验过严峻的现实;获得过成功的喜悦,也付出过失败的代价;收获过巨大的荣誉,也品尝过沉重的挫折。现在,面对历史,特别需要冷静和理智,“真实、比较、全面、辩证”8 个字,是我们必须贯彻始终的科学方针。

今年,正值新中国 60 周年华诞。用一种学术性大众读物的形式,客观地总结当代农村 60 年来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社会变迁及其历史脉络,叙述党和国家一系列发展农村的思想、理论、路线和政策,反映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面貌,考察广大农民的境况、愿望以及当前现代化、城市化浪潮中的状态和未来动向,无论对于决策者、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乃至广大的农民朋友,都是十分必要和非常及时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致,是我们始终考虑的问题。受

读者欢迎,受市场欢迎,受同行研究人员欢迎,是衡量这套丛书的三条根本标准。必须坚持严肃的学术立场和面向大众的写作方针,坚持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坚持贯彻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全面收集资料,科学分析归纳,力求做到思想平实、思路开阔、内容丰富、文字生动。

本丛书付印前,我还要感谢全体编委:苏州大学王玉贵教授、江苏大学出版社社长吴明新先生、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威尔明顿校区历史系陈意新教授、徐州师范大学周棉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房列曙教授、江西财经大学温锐教授、江苏大学董德福教授;感谢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廖进研究员、陈晓明先生、程彩霞女士给予本人项目资助,本丛书已列为“江苏社科学术文萃”。

是为序。

李良玉

2009年8月于南京大学港龙园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001

第一章 当代中国探索“三农”之路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前提/007

第一节 经典理论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论述/008

第二节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争论/012

第三节 乡村建设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经济的改造与建设/020

第二章 农业集体化道路的确立(1949 年—1956 年)/037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 “三农”思想

第一节 城市领导农村与城乡互助政策的确立/038

第二节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动/044

第三节 粮食等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047

第四节 工业优先经济发展思路的强化/056

第五节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066

第六节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制定/089

第七节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版/097

第八节 工农业协调发展思想的提出/100

第三章 人民公社化和农业的曲折发展(1957 年—1976 年)/107

第一节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108

- 
- 第二节 对“包产到户”的错误抵制/152
第三节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174
第四节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188
第五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203

第四章 发展生产力是中心任务(1977年—1991年)/209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

- 第一节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确立/211
第二节 乡镇企业的大力发展/218
第三节 农业现代化的新思路/223
第四节 农村改革的示范效应/228

第五章 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1992年—2002年)/233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

- 第一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235
第二节 农业、农村工作战略地位的始终坚持/249
第三节 农村基层政治民主的扩大/254
第四节 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258
第五节 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264
第六节 减轻农民负担和扶贫工作的新突破/267
第七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279



第六章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8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

第一节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解决“三农”问题/285

第二节 六个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与
新举措/289

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292

结 语/301

参考文献/303

后 记/309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

绪论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农村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短缺，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社会事业滞后，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社会矛盾突出，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制约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增加农村投入，改善农村条件，提高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农村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农村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1840年以来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840年至1927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帝国主义日益加深的经济掠夺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残酷压榨,中国农村经济不断破产;但小农经济虽趋向解体,却仍以其顽强的韧性结构在寻求生存机会。1840年以后,中国这个以农立国的老大帝国在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轰击下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小农经济日益破产,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和既定的国策受到了强力冲击。面对危机,早期维新派提出了“商战”思想,不久,在洋务运动的启发下,“定为工国”、“实业救国”的主张相继出场,不少实业家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尝试,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蹉跎中缓慢前行。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有志者纵然有心发展,其结果却回天乏术。戊戌维新期间,光绪帝接受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发布上谕,命令成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设立农会,创办农业报刊,购买农业机械,各省、府、州、县设立农务学堂。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号召兴办农政,农工商总局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农业机构。但戊戌变法很快宣告失败,上述主张未能实施。1903年,清政府为内外交困的情势所逼,宣布成立商部,掌管全国农工商矿等事务。商部下设平均司,主管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等事务。1906年改商部为农工商部,改平均司为农务司,农工商部除掌原平均司事务外,还兼管农业教育以及农业方面的公司、局、厂和农事实验场的设置和管理等。各省也相继设立了农务局和劝业道,一些高等院校如京师大学堂开始设立农学学科。到1909年,全国已有5所农业高等学堂,学生530人;31所中等农业学堂,学生3226人;59所初等农业学堂,学生2272人。^①辛亥革命后,中国很快陷入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之中,从中央到地方虽都设立了农业行政机构和农事实验场,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条件下,统治阶级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尚且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精力关心农村的社会经济建设。

1927至1949年为第二个阶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试图在中国确立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基础。因而,南京国民政府比较重视乡村问题,在部分地区按照“耕

^① 朱荣,等:《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者有其田”的原则进行了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同时还在部分地区开展减租运动,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在农业机构设置方面,先是在工矿部内设农政、林政两司,后改为实业部农政、渔牧及林垦署;1929年设立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1931年实业部下设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又下设农业处和棉产改进所、稻麦改进所等科研机构。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全国共有农业研究机构691个,其中国立52个,省立356个,县立174个,私立26个。^①国民政府在农业发展上所做的努力收到了一定成效,1936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5000万吨。但由于国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如帝国主义国家为转嫁经济危机纷纷向中国倾销廉价农产品,日本帝国主义不时挑起武装冲突,所有这些极大地干扰了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难有大的作为,这也为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农村社会日趋困顿。抗战胜利后,又很快爆发了全面内战,农业生产未能得到恢复。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中国的现代经济只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7%左右,其余仍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虽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并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有利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育成长,并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全国政权,但经济落后的现实不能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有多少改变。相反,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中国农村经济陷入了破产的境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中国的农村建设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其“三农”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以1978年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小的阶段。

前一阶段主要体现了毛泽东的“三农”思想,他更多的是重视制度变革,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

① 朱荣,等:《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1页。页556,下同 ② 朱荣,等:《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1页。页556,下同 ③ 朱荣,等:《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1页。页556,下同

的问题。”^①他试图通过频繁变革生产关系,一方面避免在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通过制度的力量尽可能多地从农业中提取剩余,以满足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对资金和农产品的巨额需求。考量毛泽东有关“三农”问题的思想发展历程,以1957年底为界,大体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便迅速决定发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并在土改完成后提出“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化道路,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并比预定时间大大提前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了便于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成就面前变得不够谨慎,再加上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于是片面提出了“越穷越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口号和思想,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民主革命时期一再反对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思想有所抬头。^②他还幻想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表现在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就是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取消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实行供给制,不顾条件地大量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这些都严重冲击了原有的家庭生产生活方式,并终于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惨剧,3 000多万人口非正常死亡。^③即便是在政策调整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人民公社制度不动摇,尤其是在暂时克服严重的农村危机、经济形势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又人为夸大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实际上转移了人民群众对经济形势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他严厉指责了部分农村地区开始试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发动了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发起、倡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捍卫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其巨大代价则是农业生产的长期缓慢发展,甚至是严重倒退(如“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初期),人民生活长期无法改善,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页。

②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8页。另参见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③ 同上,第323页。